

萨特

【法】让-保尔·萨特 著
黄忠晶 田锡富 黄巍 编译

自述



- 20岁时，他提出我应该是一个超人，而我高兴地接受了。
- 对我来说，哲学就是一切。这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 多数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们得奖后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我仍然活着，因为我拒绝了它。
- 知识分子的境况可能被两个方面所决定：忠诚和批判。
- 我喜欢那些漂亮女性。今天妇女的感受性比男人有趣得多。男性全都是滑稽可笑的。而女人不是。

河南人民出版社

【法】让·保尔·萨特 著
黄忠晶 田锡富 黄巍 编译

萨 特 自 述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自述/黄忠晶等编译.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6

ISBN 7-215-04667-2

I. 萨… II. 黄… III. 萨特, J. P. (1905~) — 一生
事迹 IV. 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1824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625 字数 280 千字

2000 年 6 月第 1 版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9.00 元

译者序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萨特文集,由六篇文章组成,它们从不同角度集中展示了萨特的思想和生活历程。让-保尔·萨特(1905—1980)也许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作家和思想家。有人作过统计,按其作品被人引用的多少排名次,生活在20世纪的作家和思想家中,萨特确定无疑地排在第一位。

但这位大思想家很少谈到自己和分析自己。在很年轻时他就有一个志向:向世人揭示这个世界的真理或真相;至于作为揭示者的个人,是有名还是无名,是这样还是那样,都是无所谓的。萨特的另一个特点是,不断地着眼于奔向未来的当下现在,对于过去则不屑一顾。他对自己所作的惟一分析就是自传《词语》,其中写到十一二岁时,也就是他的母亲再婚前。这里不是单纯地回忆过去,陈述事实,而是以立体、交叉、综合的方式探寻了自己文学神经官能症的由来。这部作品在给读者以人生哲理、生存意义的启迪方面更多于对他个人生活情况的了解。

由于萨特有极高的知名度,他一生中接受的访谈难以计数;由于访问者的要求,在这些谈话中他不可能不谈到自己。这样,萨特的自传性材料、他关于自己的叙述,大量地散见于各种各样的访谈录中。

萨特的谈话是很有特点的，率直真切，幽默风趣，充满哲学智慧。他谈话从不拐弯抹角，毫不顾忌社会成见，在思想的表述上敢于为天下先；在谈论问题时往往一针见血，指明实质，切中要害。读他的谈话录，让人感到很痛快，很过瘾。谈到自己时，他不加任何掩饰，不会包装自己，从不打扮成道貌岸然的样子，这对于一位世界文化名人来说，尤其难能可贵。

例如，在本文集第一篇里，萨特的学生博斯特回忆他对萨特的印象时，谈到萨特在作学生毕业典礼演讲的前夕，同他的学生一起喝醉了，最后去了一家妓院，“被一个高大结实的妓女背上了楼”。考虑到这属于个人隐私，可能有损萨特的形象，博斯特对萨特说：“如果您希望的话，可以把这段话从影片中删掉。”但萨特没有删，就让它那样展现在公众面前。他认为这没什么，因为这是事实。至于别人怎么看，那是别人的问题，他没有必要去隐瞒事实。这样，萨特关于自己的谈论就具有很大的可信度。本文集的前四篇都属于谈话性质的文字。

第一篇文字《萨特自述》，实质上是由对话组成的，而它的形式是一部电影剧本。它的主线索是萨特同西蒙娜·德·波伏瓦以及其他几位朋友在萨特或波伏瓦的寓所谈论萨特的一生，中间插有各种背景材料：新闻影片、图片、照片、萨特作品片段等。在这部影片中，萨特对自己近70年的生涯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把他这个个体的历史同人类在20世纪的大部历史紧密地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予以总体勾画。

萨特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影片中，他特别阐释了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复杂多变的时代正在和应该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影片以此开头，以此结束，由此发散开去和收拢起来，广泛涉及政治、道德、暴力、战争、自由、介入、文学、哲学等方面的重大问题，引发我们对20世纪的历史作更深层次的思考。

.....

电影《萨特自述》公映后产生极大反响。波伏瓦在《永别的仪式》一书中形容当时的情景：“评论家再次热烈赞扬萨特，观众成群结队来看这部影片。”我们虽然没有直接看到影片，但通过这个剧本，仍能感受到萨特和朋友们谈话时生动活泼的场面，观赏到与之相随的 20 世纪残酷而美丽的历史画卷。

《哲学访谈录》是萨特应一批美国的萨特哲学研究者要求而作的长篇谈话。在这个谈话中，他全面地回顾了自己的哲学历程，就一系列重大的哲学问题发表了看法。这时萨特已经 70 岁了，他的双眼几乎完全失明，无法写作。这个谈话可以看做他的哲学遗嘱。

萨特谈到，他是怎样读了柏格森的东西后迷上哲学的，他学哲学的新志向同自小就有的搞文学写作的志向之间的关系，对自己有影响的哲学家，特别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同弗洛伊德的关系，他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是否有断裂的问题，存在问题的重要性，本体论，想像问题，辩证法问题，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生活体验问题，匮乏问题，认识自我的问题，等等。

这一谈话是研究萨特哲学思想的珍贵资料，其中有不少提法值得研究者继续深入探讨。例如，萨特把“自我”排除在意识之外，当做意识的客体或准客体。这是他自 30 年代起就保有的观点，也是理解萨特哲学的难点之所在。又如，关于想像，萨特提出一种类比理论，而真正理解这种理论的人并不多。再如，谈到辩证法时，萨特指出，他在《存在与虚无》这部哲学巨著中并没有使用辩证法。这让他的研究者大感不解，因为与人们通行的看法大相径庭。在这些研究者看来，这部著作中“自在”与“自为”是一种辩证关系，似乎已成定论。

通过这篇谈话，我们对萨特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了较为充分的了解；这位大智者终生不倦地思索着世界和人生之谜，我们不能不同意他在该文结尾时所说的话：“对我来说，哲学就是一

切。这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一个人像哲学家那样生活。我像哲学家那样生活。这并不是说我是像一个好的哲学家那样生活，而是说我的知觉是哲学的知觉，甚至在我看这盏灯或看您的时候都是这样。”

《写作的目的》是萨特 1959 年同马·夏普萨尔的谈话录，最初发表在夏普萨尔《人的作家》一书中，后收入《境况》文集。在这个谈话中，萨特回顾了自己的文学生涯，阐述了对文学和写作的看法，主要涉及他的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介入”思想，对当代作家纳塔丽·萨洛特、罗贝一格里叶、米歇尔·比托尔等人的评论，暴力，他本人文学写作思想的产生与变化，给作家定位等问题。

萨特的中心思想是谈作家的介入，他解释说：“如果文学不要一切，它就毫无价值可言。这就是我所说的‘介入’。如果文学变成纯粹的形式或颂歌，它就会枯萎凋谢。如果一个写下的句子不能在人和社会的每一种水平上产生反响，那么它就是毫无意义的。……文学之美在于它要求一切，而不是对美无结果的追求，只有那个总体才可能是美的。”

这一时期法国正对阿尔及利亚发动殖民战争，在那里犯下各种暴行。萨特坚决反对这场战争，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对抗着国内狭隘民族主义狂潮的巨大压力，被视为民族公敌。他深感自己在阻止这场不义战争时的软弱无力，这一情绪在这个谈话中有明显表现。他用了较多时间谈到暴力问题，谈到作家的作用和软弱。他总结说：“整个法国社会都应该为阿尔及利亚战争负责。对在那里干的一切（拷打、集中营等）负责——整个社会包括从没有停止反对这场战争的男人和女人们。我们是无法摆脱地卷入其中：相互中伤的左翼团体之间最微小的辩论也促使了那种拷打和暴力的进行。我们所有这些好心肠的有着善良愿望的绅士实际上也干了这场战争之中的事情，结果是我们同它休戚相

关,更深地陷入暴力里去。”

《思想纪游》是十年后——1969年——萨特同《新左派评论》记者的一个谈话录,最初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后收入《境况》文集中。这里,萨特总结了自己早期和晚期思想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关系。以此为线索,他回顾了自己的整个思想历程,广泛涉及政治、哲学、历史、道德等方面的重要问题。

在这个谈话中,萨特着重谈到写作《福楼拜》的原因,写作传记作品与写小说、戏剧的关系,由此阐述了他的一个基本思想:通过对一个人的具体研究来反映这个时代和历史——个体同他生活的时代本来就是不可分割地遭遇在一起的。他还用较多篇幅谈到《辩证理性批判》(包括未出版的第2卷)的内容和特点,由此阐发了他的人学观念。

正如十年前一样,萨特发表这个谈话时,法国又遇到特大事件。1968年5月法国爆发学生造反运动,工人和市民纷纷响应,一度造成政府的严重危机。一年后,这一运动的影响和余波仍然存在。萨特结合自己的人学思想,对“五月风暴”作出评价,由此谈到革命与文化、教育等的关系。

应记者的要求,萨特还谈了自己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他对这一问题所持的审慎态度,他对“文化大革命”原因的猜测,对其内在矛盾的质疑,对中法两国“造反运动”的区别,仍然具有相当的深刻性。

本文集后两篇文字在文体上与前四篇不同,不是谈话,而是文章。《保尔·尼赞》是萨特1960年为尼赞的《亚丁·阿拉伯》一书再版写的序言。实际上,这篇长数万字的文章大大超出了一般序言的范围,成为一篇很有分量的回忆录。

一般说来,萨特几乎没有关系特别深厚的男性朋友,而保

尔·尼赞(1905—1940)是惟一的例外。他们在小学就是同学,一直上大学,除了当中几年萨特因母亲再婚离开巴黎外,他们作为同学和朋友形影相随,大学期间还共处一室。由于外貌上的某些相似特征(个子不高,黑发,斜视),长时间来,人们往往把他俩弄混淆了,这在朋友中传为笑谈。

通过这个回忆录,萨特实际上对自己二三十年代的思想和生活作了生动的记述和深刻的分析,在某种意义上是为自己这一段经历、为自己同尼赞的友谊“清账”。在分析自己一直“误解”尼赞、“误解”同尼赞的友谊的过程中,在辨析自己与尼赞之异同中,萨特既认清了真正的尼赞,也认清了真正的自己。尼赞因其父亲的人生失败及矛盾而对死亡充满恐惧,他避免单身生活、定居、参加政党、投身政治等都是为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而萨特无父无君,让自己在文学和写作中寻求不朽和永恒。他们的差异根源于此。长期以来,萨特出于友谊的需要,一直不能看清此点,以为对方同自己在追求写作的意义上始终是一致的。

虽然这个友谊是一场“误会”,萨特仍然珍惜不已。毕竟尼赞是他惟一自童年以来就有深交的朋友。整篇回忆文章充满一股深切的怀念之情。他据理回击对亡友的恶毒诬蔑,为他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呐喊,为他俩的青春和友谊而自豪,为他们的误会而遗憾。由于这一特点,文章获得读者特别是青年人的好评,评论家也普遍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散文作品之一。

本文集最后一篇文章《活着的梅洛—庞蒂》也是一篇回忆文章。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是萨特在巴黎高师的同学,抵抗时期同一组织的战友,战后《现代》编辑部的同事。梅洛—庞蒂逝世后,萨特为他出了一期《现代》专号,这篇文章就发表在这个专号上。这里,萨特主要回忆了四五十年代同梅洛—庞蒂一起工作、思考和交流讨论的情景,特别是关系到他们共同创办的刊物

《现代》。

在回忆中,萨特毫不讳言他同梅洛—庞蒂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实际上,到1952年,梅洛就退出《现代》编辑部,断绝同萨特的往来;1955年又出版《辩证法的冒险》一书,激烈抨击萨特的观点,把他们之间的分歧公之于众。人们通常所作的纪念文章,往往满足于为死者说几句不痛不痒、口是心非的赞美词和门面话,萨特完全不是这样。他实话实说,情真意切,不在意个人的小小恩怨,而是着眼于时势大局来把握、分析、理解彼此的分歧和不和;无论人对人,都不文过,不饰非,最后揭示出一种人与人关系的深刻悲剧性。我们感到,这才是对死者最好的纪念,也是对生者最好的启示,这是真正的博大胸襟。

在这篇数万字的回忆文章中,萨特写梅洛—庞蒂,也是在写他自己。正如他在文中所说:“他是我想重建的人,不是像他对他自己所是的那样,而是像他生活在我的生命中那样和我生活在他的生命中那样。我不知道在什么程度上这可能是真实的。人们将发现我是一个有问题的角色,并因为我描画梅洛的方式而否定性地描画我。非常好。总之,我是真诚的,我正按照我理解的那样来描述事物。”

同《保尔·尼赞》一样,这篇文章由于它叙述生动,析理深刻,感情真挚,情理交融,被评论者视为萨特最好最感人的散文作品之一。

这部文集的六篇文章分别从总体、从哲学方面、从文学角度、从思想的发展变化、从同他人的关系上展示了萨特的思想和生活历程。萨特逝世已有19年了,自那以来,在巴黎蒙巴拉斯公墓他的墓前(西蒙娜·德·波伏瓦去世后同他合葬在一起),每天都有不知名的人送上一束束鲜花。还有些人,把一张张小纸条放在他的墓上,压上小石头,纸条上写着一些问题——他们仍在向这位大思

.....

想者请教世界和人生的奥秘。

从译者的角度看,我们这部文集具有两重意义:对萨特来说,是奉献给他的一束小花;对读者来说,是对他们纸条上问题的解答。虽然这束花不是那样富丽堂皇,它是对这位大思想者的一点纪念;这解答也不是那样详尽无遗,而面向 21 世纪的人们或许能从中获得一点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能够这样,那就是译者最大的欣慰了。

本书是广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萨特研究”的成果。该项目是黄忠晶研究员在湛江海洋大学任教期间承接的。湛江海洋大学科研处大力支持了本项目的完成,谨此致谢。

1999 年 2 月

目 录

- 译者序言 /1
萨特自述 /1
哲学访谈录 /97
写作的目的 /163
思想纪游 /193
保尔·尼赞 /229
活着的梅洛—庞蒂 /283



萨特

自述



关于文本的说明

这是一部电影剧本，这部影片大部分拍摄于1972年2月、3月间。由于经费问题，拍摄工作停顿了3年，然后影片于1975年秋拍摄完毕，并于1976年冬作了最后的剪辑工作。它首次于1976年5月27日在戛纳电影节放映，是作为正式参赛之外的一个节目放映的。巴黎的首映式在1976年10月27日举行。

下面的文字是这部影片声迹的完整文本，我们仅在若干地方对句法作了小小改动，以便于阅读。页边注解^①是与该段文字对应出现的图像的说明，但它不是逐个地对影片的所有镜头都作出解说。

米歇尔·孔达

本片导演：亚历山大·阿斯特拉克、米歇尔·孔达。

参加本片拍摄的有西蒙娜·德·波伏瓦、雅克—劳伦特·博斯特、安德烈·戈兹、让·普隆。

① 为便于排版，原书的页边注解均用楷体字加方括号插入相应正文之前的位置。——译者注

第一部分

[1972年2月,布鲁塞尔,萨特作演讲的一个镜头。]

萨特:资产阶级总是为它的知识分子担心,它也应该这样。它带着一种警惕的目光看着他们,好像他们对资产阶级诞生地来说是一种陌生人,实际上大多数知识分子出生于中产阶级,充满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们被培养为这种文化的保卫者和守护者,他们的角色是把这种文化传送给下一代。于是,正如保尔·尼赞常说的那样,造就了一批有着专门知识的专家学者,迟早要扮演看门狗角色的。

还有一些人,甚至在他们自称信奉革命思想时,仍然有着一种隐藏得很深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他们可以反复论证自己心中想的东西,他们的语言仍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到了适当时机,他们会得到巨大的荣誉——诺贝尔奖、法兰西学院院士或别的什么牧师的俸禄——这样一来,他们又会回到羊圈里面来。

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知识分子,我也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吧,自1968年以来拒绝同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对话。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知识分子通过他的作品——如果他是一个作家的话——包括他最新的作品,拥有那种被称做意识形态兴趣的东西。显然我总是向资产阶级提出质问,同他们辩驳,但事实上我的作品仍然是用他们的语言向他们讲话,而且至少在早期作品中,有着不难发

